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刘小枫 ● 主编



[德] 施勒格尔 Friedrich von Schlegel ● 著

浪漫派风格

—— 施勒格尔批评文集

Friedrich Schlegel's Kritische Schriften

李伯杰 ● 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刘小枫 ● 主编



浪漫派风格

施勒格尔批评文集

Friedrich Schlegel's Kritische Schriften

[德] 施勒格尔 Friedrich von Schlegel ● 著

李伯杰 ●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浪漫派风格:施勒格尔批评文集/(德)施勒格尔著;李伯杰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1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刘小枫主编)

ISBN 7-5080-3603-4

I. 浪… II. ①施… ②李… III. 浪漫主义-文学评论-文集

IV. I109.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2517 号

Friedrich Schlegel's Kritische Schriften

[德]Schlegel 著

责任编辑:陈希米

装帧设计:闫志杰 刘佳景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圣瑞伦印刷厂

版 次:2005年1月北京第1版

200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670×970 1/16

印 张:18.5

字 数:300千字

定 价:35.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当第十个月停在天庭
世上便出现了奇迹。
迈亚生下了一个孩子，满是狡黠和魅惑，
赫耳墨斯偷了牛群，带来了梦。
他窥守着夜，看着大门，
很快，他要在永生的神们之中展示奇迹。

—— 荷马《献给赫耳墨斯的颂诗》，11-16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死者的向导，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解释学（Hermeneutic）一词便来自赫耳墨斯（Hermes）之名。

听我说吧，赫耳墨斯，宙斯之使，迈亚之子！

你有慷慨的心，纷争的判官，死者的主人，

你不吝妙见，懂得征服阿尔戈斯，

你是飞鞋的信使，凡人们的朋友和先知，

你喜爱运动、计谋和装假，精力多么充沛，

你解说万物，庇护商客，除却忧愁，

手握无懈可击的和平之杖。

克利克的神啊，你宽厚乐助，言语千般颜色，

你助我们劳作，爱必然中的凡人，

有神妙无比的言语武器。

请听我的祈祷，为着我的劳作生命，

赐我幸福终局、言语之恩和记忆吧！

—— 俄耳甫斯《献给赫耳墨斯的颂诗》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五十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四十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八十年代中期形成振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八十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选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九十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选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

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尽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於北京



费·施勒格尔肖像
A. 封·布特拉尔 画

译者序

“对于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我们有大量矫枉过正的工作要做，因为在我们文化上黄金时代的大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在其有生之年便已受到这样的误解，遭到如此恶毒的诽谤。奇怪的是，时过境迁已久，而叫骂声时至今日依然不绝于耳。”的确，谁若有兴致收集二百多年来德国早期浪漫派文学的代表人物和精神领袖弗·施勒格尔生前死后得到的种种评价，定然会满载而归。赞美施勒格尔者不乏其人，而欲置这堆“肥肉”于死地而后快的人更是阵容强大，占尽上风。无奈这个“不道德的人”却打而不死，反而屡屡如凤凰涅槃，引起后世纷争无数。“一百个人眼中有一百个莎士比亚”，而一百个人眼中却恐怕不止有一百个弗·施勒格尔，因为施勒格尔一生多变，无论人品、性格和思想都很复杂，难以“一言以蔽之”。了解他的最佳方法，当然是直接解读他的作品，在这个文本至上的时代，这一点想必会得到广泛的认同吧。这里仅对弗·施勒格尔其人及其生活的时空环境勾勒一个大致的轮廓，或许这个文本对有兴趣解读弗·施勒格尔的人会有所帮助。

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于1772年3月5日生于德国汉诺威的一个新教牧师家庭。在德国文化史上，“施勒格尔”是一个闪光的姓氏。从17世纪起，施勒格尔家族为德国提供过众多颇有名望的批评家、诗人、历史学家、宫廷显贵、法学家，其中最著名的当然非弗里德里希及其兄奥·威·施勒格尔昆仲莫属。此外还有被誉为“18世纪的德国在莱辛之前所拥有的最天才的批评家”的约翰·埃里亚斯·施勒格尔等人。

这个背景不仅对于他本人，而且对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都有着明显的象征意义。施勒格尔兄弟从这个家族接受过来的遗产，可以概括为批评与新教这两个概念。他们毕生与批评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弗·施勒格尔后来的改宗旧教也不可简单地视为对新教思想的背叛。新教背景意味着他将遵循德国宗教改革的思想传统和思维方式，沿着遵循马丁·路德开创的所谓“内在心性”的道路走下去；意味着他将承袭新教文化特别注重文字与阅读的传统，成为一个地道的文人，毕生与文字为伍，就连他日后皈依天主教的事件也离不开他的新教背景。在当时的历史语境

中，新教还意味着崇尚个性与个人价值、独立性。总之，新教背景意味着一种新的价值观。他出身于牧师家庭，这给他的思想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德国启蒙运动的名人当中不乏牧师背景的人物。牧师隶属市民阶层，与贵族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施勒格尔青年时期之大力标榜共和主义，与他的牧师家庭背景也不无关系。不过德国的市民阶层与贵族的关系比较特殊，存在着冲突与依靠两个方面。施勒格尔后半生投奔奥地利皇室，而不是继续同贵族阶层的对抗，这究竟是他看到德国市民阶层势单力薄、难成大气的事实，因而背叛本阶级、以图一己之荣的举动，还是出于他观念的转变，欲借天主教和“神圣罗马帝国”大一统的诉求和组织架构来实现他所追求的综合，恐怕二者兼而有之。总而言之，他早年的浪漫派经历以及他后来背离浪漫派的行为，都与他的背景有着密切关系。

他自幼性格倔强、内向，性好沉思，不善理财，不喜学习，成为家里的“问题孩子”，使他的父母不知如何是好。即便他成年后，也经常需要其兄奥·威·施勒格尔的照顾。15岁上，他被父亲送往莱比锡习商，结果却适得其反。年轻的施勒格尔憎恶这门谋生的职业，痛苦之极，父母最后不得不同意他放弃习商，改学人文科学。于是16岁的施勒格尔身上突然迸发出了无限的智力和活力，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不但自修补完了文理高中的课程，而且还精通了希腊文，如饥似渴地阅读柏拉图的原文著作，他日后成为希腊文化研究的权威，便是得益于这段“读书狂”的时间。1790年，他随其兄进入哥廷根大学修习法律，次年转到莱比锡大学，弃法习文，立志要从事文学批评，作一个自由作家。这段时间里对他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他结识了一位日后成为早期浪漫派文学主将的诺瓦利斯，以及后来一度成为他的嫂嫂的卡罗琳娜·波麦。此外他也认识了席勒，但话不投机。1794年，他转到德累斯顿继续求学，潜心学习古典文化。对于古典文化，他表现出一种令人震惊的狂热，致使人们封给他一个不知是褒是贬、或者亦褒亦贬的绰号“希腊崇拜狂”。不过他的倾向是古为今用，用古人的药方来医治现代的病症，并非食古不化。

这时的他才华横溢，开始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一部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读罢，他胸中萌发了一个强烈的愿望，要做“文学中的温克尔曼”。到1798年为止，他已有《论希腊诗各流派》（1794）、《论共和主义的概念》（1796）、《论希腊人和罗马人》、《论格奥尔格·福斯特》、《论莱辛》（1797）等颇有影响的论文发表，文化界为之侧目。他先赴耶

拿，加入出版家莱夏特的杂志《德意志》，后来又赴柏林，在莱夏特的杂志《美艺术学苑》撰稿，开始了自由撰稿人的生涯。他的兄长奥·威·施勒格尔则在耶拿席勒的杂志《四季女神》工作。后来因为他同席勒产生了激烈冲突，导致他的兄长奥古斯特·威·施勒格尔被席勒辞退。德累斯顿时期对于他的一生关系重大，他不仅创作上硕果累累，而且结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友人，如路德维希·蒂克、施莱尔马赫以及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多罗苔娅·怀特等人。在柏林时，他们经常在亨丽爱特·赫尔茨的家中聚会，高谈阔论，畅谈对文学、世界、宇宙人生的看法。兴趣的相同，见解的相近，使他们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多罗苔娅·怀特是大名鼎鼎的德国犹太裔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之女，19岁时遵父命嫁给了柏林的银行家西蒙·怀特。二人精神意趣相差甚远，多罗苔娅苦熬了13年之后，于绝望之时遇到了比她年轻8岁的施勒格尔。俩人一见钟情，多罗苔娅便决意解除不幸的婚姻，终身伴随施勒格尔。施勒格尔感到无比幸福，便把他的感受大胆地写成小说《路琴德》并发表，读者可以从小说女主人公的身上清楚地看到多罗苔娅的形象。

施勒格尔和他的友人们与老一辈的启蒙运动家如尼科莱等人思想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分歧，与文坛上的名宿如席勒等人冲突不已。这批新人才思泉涌，意气风发，急于改变现实，同时也不乏称霸文坛、当一回文坛霸主的念头。他们并不缺乏新思想、新见解，所缺的是一块属于自己的阵地来实现自我。此外，施氏兄弟在别人的杂志里“为他人做嫁衣裳”，经历也不尽愉快。于是一个共同的愿望产生了，这就是创办一个属于他们二人的杂志以传播自己的思想。施勒格尔在一封信里对其兄说道：“长久以来我一直在憧憬着办一份我们共同的刊物，即一份不仅由我们二人编辑，而且完全由我们二人撰稿的刊物。”这个愿望的结果，就是著名的杂志《雅典娜神殿》的诞生。这本杂志一问世，就成为德国早期浪漫派同仁的喉舌，因而也是德国早期浪漫派的文学宣言。《雅典娜神殿》出版，标志着德国早期浪漫派的正式成立，并进入了鼎盛时期。在弗·施勒格尔的主张下，杂志在创办宗旨上便力求不同凡响。杂志不仅刊登文学评论，而且更主要的是它本着浪漫主义的精神，涉及精神科学的一切领域，要求杂志展现“百科全书”的性质，即他本人所提倡的所谓“总汇性”的风采。1798年5月到1800年8月，《雅典娜神殿》总共出版了3卷共6册，其中最著名的是弗·施勒格尔撰写的断片，即后来的《雅典娜神殿断片集》。

1800年以前，施勒格尔受柏拉图、温克尔曼和费希特等人的影响，

推崇理性，同时对理性主义的后果，如一系列的分裂及功利主义等问题给予极大的关注。在欧洲世俗化的过程中，基督教神学逐渐丧失其精神支柱的作用和地位。启蒙运动的兴起，加快了世俗化的进程，理性取代神性的大趋势已无法逆转。施勒格尔最为关切、也是他最痛心疾首的，就是价值的缺席。神性式微而理性亦非完善，何处寻觅价值和意义，就是施勒格尔们念念不能忘怀的。施勒格尔生逢其时，他本人不遗余力地参与到寻找意义的潮流中。施勒格尔及其同仁的对策，就是给美以特殊的关注，大力提升艺术的地位。自康德哲学树立起其影响之后，纯粹的美之不含功利性，不带功利目的，已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接受。而艺术作为美的载体，地位亦骤然提升。一时间，谈论美、崇尚美、赞扬美蔚然成风，所谓“艺术时代”应运而生，成为德国文化史上的一道独特景观。施勒格尔饱受这种时尚的熏陶，在青年时期同样大力推崇美，推崇艺术，言必称希腊，以致被视为“希腊崇拜狂”。而且此时正当德国唯心主义大行其道之时，世界的本质在于精神这样一个基本观念可谓深入人心。施勒格尔认为，诗乃是因果链上最顶端的事物，因而也是最高的事物。所以，要想让社会进入良性发展，就必须使社会具有诗的品质，换言之，要把社会诗化，即所谓“人生与诗合一论”，施勒格尔企图借此创造一种新的诗学价值观，以替代已经失落的神学价值观。

弗·施勒格尔涉猎广泛，在人文科学的许多领域中均有建树，但是他的功绩，或曰他不同于前人、给后人以启发的，主要在于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这几个方面。不过，孤立地看待施勒格尔在这些领域的建树，不能得其要义，只有把这些文本放在一个更大的语境中来解读，才能悟出其要旨。

他的早期论文，如《希腊诗研究》（1797）和《希腊人及罗马人的诗歌史》（1798），仍旧秉承时代风气，奉古希腊艺术为主臬。但是他已经意识到现代文化与古典文化的差异，用崇尚“美”与追求“有趣”来划分古典与现代。进入浪漫运动时期，施勒格尔表现出极大的创造力，提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主张。他认为理性主义已经建造起一座辉煌的大厦，但是同时也开始僵化，限制了“天才”即创造力的发展。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概念，以抗拒理性的桎梏。他提出“断片”说同形式逻辑相对，反对完整的体系，认为甚至一句话一经出口就已经固化、僵化，会束缚精神的活力，所以他企图用“断片”的开放性来对抗体系的封闭性，以激活精神，使精神始终保持在运动状态中。他的这一主张对尼采产生过较大影响。他还强调“机智”的概念，目的也是在于把运

动引入思维。与笑话同出一源的“机智”可以通过噱头、即出人意料思路或结局使精神突破常理的限制，以保持创造力的活跃。在他最富于创造力的青年时期，施勒格尔写下了大量断片，以实践他的主张。他强调“交友”的概念，既在人际关系的层面上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亲近与友爱，又在哲学层面上强调事物之间的共性、统一性、和谐，同启蒙理性主义对事物进行分门别类的做法相抗衡。在文学理论的领域里，他最重要的成就在于大力强调历史在文学批评中的意义，强调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变化与运动。施勒格尔的文学观受到温克尔曼的影响，也把文学看成一个从生成、发展、繁荣到衰落的循环过程。这个循环论意味着强调历史与变化，把历史的维度引入了文学史，突破了一成不变的文学观。他主张创造“总汇诗”，即一种无所不包的综合艺术，把迄今为止各自独立的艺术形式、体裁囊括其中。这种综合艺术的具体体现，就是他所说的“小说”。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上，他提出“浪漫反讽”说，极力强调主体高于客体的地位。他认为诗人不必受法则的束缚，“天才”可以越过现实的限制。他意识到工具理性膨胀的后果，在长篇小说《路琴德》（片断，1799）中提倡闲散无为的生活方式，写下了一曲“慵懒”赞歌，以此同工具理性的目的性相抗衡。在《路琴德》中，施勒格尔记录了他与多罗苔娅的关系。他们的关系在德国市民和文学界本来就引起了轩然大波，而小说的发表更无异于火上浇油，抨击和谩骂纷至沓来，指责作者歌颂“肉欲”、礼赞“懒散”。而《路琴德》之所以触犯众怒，实则是因为作品否定了西方世界长久以来所遵循的爱情和婚姻哲学，强调真正的婚姻决非法律关系，而是道德关系，两个人在变成一个人的时候却仍可各自保持自己的个性。这些在今天看来理所当然的观点，在当时却是有违传统和正统观念的，当然不能见容于社会。施勒格尔还对当时的两性关系进行了批评，主张妇女解放和恋爱自由，明确指出当时的社会中婚姻对于夫妻双方的意义：男人需要从女人身上得到性满足，女人想要从男人身上获得财富、地位。他还著有悲剧《阿拉尔柯斯》（1802）。

1800年，施勒格尔的《谈诗》发表。这部作品采用柏拉图《对话录》的形式，总结了早期施勒格尔及德国早期浪漫派的世界观和艺术观，也暗示作者正在经历的思想转折。这部重要的作品从四个方面集中阐述了文学的本质，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神话的谈话》。这篇作品放弃了批判哲学的立场，转向同一哲学，认为艺术作品具有有机整体的性质，本身就是生活。作者把诗看作神话，认为现代同古代的区别就在

于，神话构成古代文化的内核，而现代文化缺少这样的神话，因而现代社会失去了中心。因此，现代人的任务就是创造一个新神话。但是施勒格尔在作品中也表现出强烈的历史意识，认为古代神话生长的土壤已经无迹可寻，现代文化只能借助唯心主义哲学从精神中创造出一个新神话来。《谈诗》表明，到1800年为止，尽管施勒格尔的著作中有着变化甚至矛盾，但是也存在着一脉相承的脉络。

然而好景不长，诺瓦利斯不幸英年早逝，浪漫派同仁内部亦因意见不和及人际关系而纷争迭起，这个一度人丁兴旺的共同体弹指间便落花流水，烟消云散。施勒格尔本来就谋生乏术，再加上意兴阑珊，无奈之余，1802年携多萝茜娅远走巴黎，在那里举行了一系列介绍德国当代文学、哲学的讲座，并写下了《法兰西之旅》，记载了他思想的转变。在巴黎，他发现了一个新的概念，即欧洲。次年，他开设了关于欧洲文学史的讲座，呼吁欧洲人应该注意到欧洲文化的共性，为欧洲的统一做准备。然而不久后，施勒格尔又对欧洲感到失望，认为从古希腊罗马开始，欧洲就走上了一脉以个人意识为核心的道路，不可避免地导致在人类生活和认识的各个领域全面解体。虽然浪漫主义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试图把浪漫元素灌注到欧洲文化当中，但是这也并不足以解救欧洲于分崩离析，因为浪漫主义实质是唯心主义哲学的产儿，并非真正的浪漫。要想找到真正的浪漫精神，就必须把目光投向东方，具体地说，就是投向印度。只有扭转视角，从印度引进真正的浪漫精神，才有希望完成复兴欧洲的伟业。在巴黎期间，他学习了梵文，并于1808年出版了《论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这本比较语言学的巨著是印度日耳曼语言科学的第一部经典著作，这部著作的出版也使他成为德国梵文研究的奠基人。此外，他还把梵文研究引入德国，从此，德国成为世界上研究梵文的重镇。

在施勒格尔生涯的中期与后期，他又大力推崇爱。除了对抗功利性之外，更强调宇宙万物和人的完整性、统一性。在他看来，在爱当中，一切对抗、冲突、分解、割裂都被克服，爱乃是打开统一与和谐之门的万能钥匙。近代科学发展初期，分析是首要的任务。科学研究不断地分解、分类，以此增进对宇宙的了解。分析、分解的方法不可避免地也会对其他学科以及整个文化产生影响，在其影响之下，“分”成了一个普遍的趋势。席勒在分析了古希腊罗马的文学之后，指出古代诗的特点是素朴，近代诗的特点则是感伤，原因在于人不但开始对自然进行反思，同时也开始对人自身进行反思。而一旦人对自己开始进行反思，人本身

就分裂了，产生一个被反思的人，以及一个实施反思的人。在这一点上，施勒格尔也持有相同的看法。在施勒格尔看来，由于不断地分解，人本身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如果任其发展，完整的、统一的、和谐的人将不复存在。针对人自身分裂的威胁，施勒格尔针锋相对地提出统一的理想，即“综合”。在他著名的《雅典娜神殿断片集》第116条中，他是这样说的：“浪漫诗是渐进的总汇诗。它的使命不仅在于重新统一诗的分离的种类，把诗与哲学和雄辩术沟通，它力求而且也应该把诗和散文、天才和批评、艺术诗和自然诗时而混合起来，时而融会于一体，把诗变成生活和社会，把生活和社会变成诗……”由此可以看出，施勒格尔综合的理想又是与其诗学价值观紧密相联、息息相关的。这个综合的理想已经深入他的意识深层，支配着他的思维和行动，即便在他生涯的中、后期，当他脱离新教、皈依天主教之后，他也并未放弃这个追求。施勒格尔之皈依天主教，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天主教的统一性及其对统一性的追求所折服，企图借天主教的统一克服新教的分裂。

1795~1805年这10年，是施勒格尔的创作高峰期，被他戏称为“哲学的学习年代”。

1805年，施勒格尔开设讲座，论述“包罗万象的历史”。1810年，他开设了“论近代史讲座”。这表明，他的思考产生位移，他思考的中心从文学艺术移到历史研究当中。历史对于他而言，乃是“所有科学中最广博、最普遍、最高级的科学”。与此相反，他放弃了过去认为诗是惟一能够使人的所有能力得到和谐发展、因而是惟一能使人获得全面发展的观念，认为诗和艺术不再是解放生灵、拯救人类的必由之路。文学只有同“生活”产生关联，才有存在的权利。1812年，施勒格尔开设了“古今文学史”的大型讲座，再次阐述他关于历史的看法以及历史与诗的关系。他认为，文学是民族精神、民族性的体现，是“一个民族精神生活的总体概念”。文学史的任务不是罗列史实、介绍作家生平和作品梗概，而是要寻找“每个时代中文学的精神、总体的文学以及它在最重要的民族中发展的轨迹”。此外，他还开创了对中世纪文学的研究，在其中寻找欧洲各国文学的相同特征。在施勒格尔写作文学史的过程中，也可以清楚地见出“综合”、“整体”的观念的支配作用。在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学早已深入人心的时代，施勒格尔把国别文学或民族文学视为一个总体文学的分支，力求还这个居于各民族文学之上的大文学以原貌。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指出，“至少西方文学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个理想是由19世纪初期文学史的创始人，如施勒格尔兄弟……

等人，设想出来并且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实现的”。

1807年4月，施勒格尔在科隆正式改宗天主教，在德国文化界再次引起轩然大波。此后一段时间，他也不再满足于舞文弄墨，而是投身政治，直接染指现实政治。此外，他在德国处境不佳，而且长期颠沛流离，居无定所，也使得他决心到奥地利去寻找一个施展政治抱负的天地。他一面继续从事研究和教学，一面投身政治，于1809年在奥地利皇家军队委员会谋到了一份差事，创办了军队的《奥地利观察家报》。1813年，他受梅特涅之命为德意志邦联起草宪法草案，同时还撰写政治宣传品，由梅特涅任命为奥匈帝国驻法兰克福公使馆参赞，并被教皇授予基督勋章，1815年被册封为贵族。但是施勒格尔命运多舛，仕途不畅；他政治上的才能并不尽如人意，加之他的自由化意识、要求解放犹太人及妇女解放等主张，使他的仕途梦转眼间成了一枕黄粱。1818年9月，他被解职离开法兰克福，次年2~8月陪同奥皇弗兰茨和梅特涅游历意大利，然后返回维也纳。此后便重操旧业，除了专心著书立说举办讲座之外，便是喝葡萄美酒，吃鹅肝佳饼，过起了隐居生活。这段时间里他留给后世的，只有一部《古今文学史》讲稿有较高的价值。

另一方面，他的文学观、历史观、哲学观也经历了一系列异变。此后，施勒格尔不再奉艺术和美为主臬，而是以历史研究为己任，同时把目光投向宗教和东方。宗教、尤其是天主教，对于施勒格尔来说，意味着寻找意义的一条新途径。他希望可以假宗教之途找到一种对于个人和历史都具有积极性的双重意义规定，在超验的、和谐的、深层次的价值平台上把被割裂的世界、被分裂的个人重新综合起来。中世纪基督教的大一统历史恰好给现实树立了一个实在的典范，给他寻求统一的诉求提供了借鉴意义。

施勒格尔在维也纳的最后10年，是他学术上的又一个多产时期。1822年，他开始整理、修订从前的著作，1825年出版了5卷本全集；不过《雅典娜神殿断片集》、“愚蠢的”《路琴德》等青年时期的天才之作，在这个版本中竟无立锥之地。除此之外，他还办过杂志。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施勒格尔进入他研究生涯的第三个创作高峰。1827年至他去世，他接连开设了《生命哲学》、《历史哲学》和《语言和文字哲学》三个大型哲学讲座，对欧洲衰落的事实进行哲学反思，企图找到应对的良策。他认为，历史发生巨变之时，倘若统治阶层无力审时度势、把握时机以趋应对，历史将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传统的力量对比将毁于一旦，这将是非常可怕的。不过，新生